

Mark Granovetter  
Richard Swedberg

#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 经济生活中的 社会学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  
[瑞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编著

瞿铁鹏 姜志辉 译  
瞿铁鹏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经济生活中的 社会学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  
[瑞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编著

瞿铁鹏 姜志辉 译  
瞿铁鹏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 / (美) 格兰诺维特, (瑞典) 斯威德伯格编著; 瞿铁鹏, 姜志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ISBN 978-7-208-12230-7

I. ①经… II. ①格… ②斯… ③瞿… ④姜… III. ①经济社会学 IV. ①F06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6516号

责任编辑 雷静宜  
装帧设计 肖晋兴



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

[美] 马克·格兰诺维特 [瑞典]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编著  
瞿铁鹏 姜志辉 译 瞿铁鹏 校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25  
字 数 515,000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230-7 / C · 460  
定 价 98.00元

*The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 by Mark Granovetter and Richard Swedberg  
Copyright © 2001 by 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through Bardon Chinese-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 录

第二版导论	1
<b>第一部分 经济社会学原理</b>	
1 卡尔·波兰尼 经济——有制度的过程	35
2 马克·格兰诺维特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56
3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 马克斯·韦伯的经济社会学观点	85
4 皮埃尔·布迪厄 资本的类型	104
5 阿列简德罗·波特斯和朱丽娅·森森布伦纳 嵌入性与移民：经济行动的社会决定因素	120
<b>第二部分 市场社会学</b>	
6 克利福德·格尔茨 集市经济：农民做买卖时的信息和搜寻	149
7 维维安娜·泽利泽 人的价值与市场：19世纪美国人寿保险和死亡案例	157
8 威廉·布里奇和罗伯特·尼尔森 男女工资不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学研究	176
9 斯图尔特·麦考利 商业中的非契约关系：初步研究	206
10 布莱恩·乌兹 公司间网络中的社会结构和竞争：嵌入性悖论	223
<b>第三部分 企业与产业社会学</b>	
11 乔治·斯特劳斯 群体动力学与群体间关系	261

12	梅尔维尔·多尔顿 管理者	267
13	阿瑟·斯廷奇库姆 生产的官僚体制式管理与手工艺式管理：比较研究	295
14	保罗·赫希 时尚产品的加工：文化产业体系中的组织丛分析	311
15	威廉·罗伊 解释美国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兴起的逻辑和历史逻辑	331
16	马克·格兰诺维特 重新思考科斯：现代经济中的企业集团	354
17	安娜李·萨克斯妮 内与外：硅谷和 128 公路的地区网络与产业调适	387

#### 第四部分 比较的和历史的经济社会学

18	兰德尔·柯林斯 韦伯晚年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化	411
19	弗兰克·多宾 为什么经济反映政体：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早期 铁路政策	434
20	罗纳尔德·多尔 商誉和市场资本主义精神	461
21	加里·汉密尔顿和尼科尔·伍尔西·比加特 市场、文化与权威：对远东管理与组织的比较分析	482
22	戴维·斯塔克 东欧资本主义的重组产权	519

索引		549
----	--	-----

## 第二版导论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和马克·格兰诺维特

本文集第一版于1992年问世，自那时以来，人们对经济社会学已产生极大兴趣。例如，经济学家不断突破经济学与社会学传统的分界线，几个诺贝尔奖已颁发给诸如此类努力的成果。在美国产生并持续快速发展的“新经济社会学”已开始在欧洲及世界各地发芽生根。关于“嵌入性”的论据已提出来了，就如本文集新增部分证明的那样。经济社会学的文化研究也增强了，如同从社会学视角出发理解市场运作的尝试。最后，美国社会学协会已建立了经济社会学分会，经济社会学教科书开始出版（Carruthers and Babb, 1999；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类似教科书，参看 Mikl-Horke, 1999；Steiner, 1999；Trigilia, 1998）。 1

不过即使局面看起来不同于1992年，我们的基本主旨不变：**至关重要的是要开展关于经济的学术争论，真正纳入社会视角并把现实人们的互动放在其核心地位。**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很明显：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并不独立于社会的其余部分，而且经济学应当研究日常经济活动中的人。然而，在纯学理的经济学中，对立的观念几十年来一直占支配地位，而且现在仍支配着话语权。个中主要原因在于，在20世纪早期，经济学家开始相信，如果做不出一系列简化的假设，经济学就不可能取得最大的进步。另外，这些假设通常意味着，必须使用非社会的研究方式，理论论证取代对现实的人及其经济互动的分析。

我们并非暗示经济学不应是数理性质的。的确，基本的分析抽象过程在任何时候都是有用的，而且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等学者已进行过出色分析。然而，我们所论证的迟早必定会实现，使“经济的”东西与“社会的”东西这样截然分开是不明智的。我们认为，理论经济学不应垄断经济分析，对于这种分析来说，经济史、经济社会学和其他视角同样都是必需的。 2

尽管这具有讽刺意味，然而首先挑战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这种人为分工的还是经济学家本身。其他社会科学家经常加入其中，他们认为经济模型可能对非经济主题也有作用。1950年代中期就有朝这一方向的最初尝试，当时一些学者，如加里·贝

克尔 (Gary Becker)、詹姆斯·布坎南 (James Buchanan) 和安东尼·唐斯 (Anthony Downs) 就认为, 经济模型能用来分析政治主题 (例如, 参看 Swedberg, 1990a; Udehn, 1996)。1960 年代, 这种新的研究方式范围扩大至历史、法律和人口。到 1970 年代中期, 所有这些研究看起来有一些共同点; (经济学家本身) 越来越多地用“经济学帝国主义”这一词来识别它们。1976 年, 贝克尔发表了一篇重要的纲领性的论文, 标题为“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方式”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它变成这一思想流派的一个相当鲜明的宣言 (Becker, 1976)。在那个时候, 许多有建树的经济学家还带着点怀疑的眼光看待这种新研究方式。但是, 当詹姆斯·布坎南于 1986 年获得诺贝尔奖, 贝克尔于 1987 年成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时, 所有人都明白, 把经济学模型引入其他社会科学的尝试, 在经济学同行中已开始变成值得尊重的努力了。

我们将批评这种“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方式”的某些方面, 包括这一理念: 现存经济制度最好被理解为对经济问题的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也认为, 纯粹经济学模型很少适用于分析超出经济学范围的问题, 从亚当·斯密 (Adam Smith)、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到肯尼斯·阿罗, 这些经济学家都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然而, 目前我们要回避这一问题, 反而强调像贝克尔、布坎南和唐斯那样的经济学家是重要人物, 他们在 20 世纪中叶开始, 最先向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这种特殊分工提出挑战。他们表明, 你不应该假定某些主题本身属于“经济的”问题 (比如: 为什么某物花费那么多?), 而另外的主题本身属于“社会的”问题 (比如: 为什么人们那样投票?)。

受“经济学研究方式”支持者的激励, 其他社会科学家也开始质疑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截然分明的界线, 他们对于新分工应是什么样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重建经济学与社会学关系的一些主要方略如下:

- **新经济社会学** (马克·格兰诺维特 [Mark Granovetter]、哈里森·怀特 [Harrison C. White]、维维安纳·泽利泽 [Viviana Zelizer] 和其他许多社会学家; 例如, 参看 Swedberg, 1997; Callon, 1998)。关键见解是: 依据传统被视为属于经济学阵营的很多经济学问题, 借助对社会学因素的考虑可以得到更好的分析。

- **理性选择社会学** (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Coleman]、维克托·尼 [Victor Nee]、迈克尔·赫克特 [Michael Hechter] 及其他一些人; 例如, 参看 Coleman and Fararo, 1992; Brinton and Nee, 1998)。基本的理念是: 需要把理性选择作为基本的研究方式以改革所有社会学。

- **新制度经济学** (奥利弗·威廉姆森 [Oliver Williamson]、道格拉斯·诺斯 [Douglass North] 及其他一些人; 例如, 参看 Eggertsson, 1990; Furubotn and



Richter, 1991)。制度在经济中起关键作用，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常用方法，我们可能会充分理解这些制度的产生和功能发挥，这与下述这种理念结合，即无论利用制度还是市场都有专门的成本（诸如交易成本和强制执行的成本等）。

● **经济学帝国主义**（加里·贝克尔、杰克·赫什利弗 [Jack Hirschleifer] 和其他一些人；例如，参看 Becker, 1976; Hirschleifer, 1985)。微观经济学不仅能用来分析任何经济的事情，也能用来分析社会中别的事情，包括政治、犯罪、宗教、文化和家庭。

● **行为经济学**（阿莫斯·特弗斯基 [Amos Tversky]、丹尼尔·卡尼曼 [Daniel Kahneman] 和其他一些人；例如，参看 Thaler, 1991; Shiller, 2000)。主流经济学以错误心理学为基础，因此，不同的决策心理学应该引入关于行为的经济学模型。

还有更多方略。在过去几十年里，产生了名为“法学与经济学”的思想流派，在各法学院很有影响力，而且已对法院系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的基本论点是，市场逻辑对法律事件的裁决方式也应是决定性的（例如，Mercurio and Medema, 1997)。博弈论在经济学家中越来越流行，而且也已应用于一系列非经济现象（例如，Shubik, 1982; Axelrod, 1984; 博弈论与社会学方面，参看斯威德伯格即将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对社会学比主流经济学有更正面的态度——是争论的一部分（例如，Grouch and Streeck, 1997;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 Etzioni and Boettke, 1994。关于奥地利学派的某些经典著作，参看 Mises, 1949; Hayek, 1948; Kirzner, 1973)。单个学者有时走他们自己的、独特的道路，比如乔治·阿克洛夫 (George Akerlof)，他的研究从 1970 年代早期延续到现在，其特点是努力把社会学、心理学与人类学的各种见解引入经济学模型 (Akerlof, 1984, 1997)。

然而，这本文集特别重视介绍已因“新经济社会学”而闻名的那些观点。因此，我们首先将简单介绍这些观点的历史和背景。然后，我们将简略说明经济社会学家可利用的概念工具以及怎样应用它们。

## 经济社会学简史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时，经济的主题与社会的主题几乎没有截然分开（关于经济社会学史，参看 Swedberg, 1987; 简明版，参看 Swedberg, 1991)。19 世纪，这两个主题反而很容易结合，尤其是在德国，这种制度类型的经济学的地方形式开始被命名为历史学派。另一方面，在英国，大卫·李嘉图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很快使更

为抽象的分析流行起来，到 19 世纪中叶，“经济人”概念已经产生了（例如，Persky, 1995）。两种视角——德国的经济—社会的视角和英国的抽象演绎视角——要同时并存有极大困难，在世纪之交它们激烈地相互碰撞。这场斗争在德国和奥地利是从 1880 年开始的（通常被叫作“方法之争”[*Methodenstreit*]）而且很快传播到其他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抽象—演绎的研究方式最终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整个 20 世纪，后一派经济学家即便要被认定为“经济学家”的主张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消失于新的学术类别——即经济史学家，一时间，“制度主义者”在主流经济学话语内几乎成为一种侮辱性称号。

历史经济学家对社会学产生了好感。原因很简单：与其说社会学与像李嘉图和门格尔（Menger）那样的学者的抽象演绎研究方式有亲缘关系，还不如说明显与历史经济学派有亲缘关系。的确，第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或者说，起码是创造了“社会学”这一术语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在 1830 年代也批评过经济学家太过于抽象和非经验的特点。孔德的批评在本世纪初由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重新唤起，成为“方法论之争”的一部分。在社会学家中，埃米尔·涂尔干的经济社会学方案与孔德的立场有紧密联系。其他经济社会学奠基者，马克斯·韦伯，对待经济学家根本不像涂尔干那样怀有敌意。的确，韦伯在其学术生涯的前半生一直作为经济学家工作，而且在公共场合总将自己认同于经济学家。韦伯关于经济学的理念最终与其说接近于经济学家，还不如说更接近于涂尔干和历史学派的理念。

涂尔干经常讨论经济的主题。比如，他那关于社会分工的重要学位论文（1893），像《社会学方法的准则》（*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1895）和他的其他一些作品一样，鲜明地批评经济学家将其主题孤立于任何“社会的”事物的倾向（参看 Durkheim, [1893] 1984, [1895] 1964）。涂尔干认为，不像在“经济人”独特虚构中那样，人类从来不是孤立的：“他有时间，有国家；他有家庭、城市、祖国、宗教和政治信念；所有这些因素与很多其他因素以许多方式融合并结合在一起。关于在整个西方历史进程中对财产的尊重态度是如何产生的，涂尔干也留下许多有极大吸引力的讲稿（Durkheim, [1888] 1978: 49–50）。在他创办的《社会学年鉴》（*l'Année Sociologique*）杂志的每一期中，他都务必做到把关于“经济社会学”的内容列为一个部分。

但是，经济学从来没有像道德、宗教和教育那样令涂尔干着迷，而它是韦伯的主要专业兴趣之一（关于经济社会学家韦伯的概述，参看 Swedberg, 1998；韦伯经济社会学文选，参看 Weber, 1999）。例如，他写的关于中世纪贸易公司，以及研究古代文明农业社会结构的主要作用的论文（Weber, [1909] 1976a, [1889] 1988）。作为经济学家，韦伯也写过有关工业关系和股票交易所的论文；而且他还曾参与一场关于经济理论是否不仅适用于工业社会也适用于前工业社会的重大讨论（参看 Weber, [1909] 1976b,

[1908–1909] 1988, [1894] 2000)。

韦伯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三部重要著作是：《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宗教社会学》(*Collected Essays in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和《经济通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1920] 1951, [1921] 1952, [1921] 1958, [1922] 1978, [1923] 1981)。第一部是部异常丰富的著作，其中包括（多达 150 页）的重要一章，韦伯在这一章中介绍了经济社会学的理论方案，也就是著名的第 2 章——“经济行动的社会学范畴”。韦伯对经济社会学的第二大贡献可以在题为《宗教社会学》的这部论文集中找到，《宗教社会学》可以说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修订形式成为这部论文集的一部分）的补充。在对这一研究的特殊兴趣中，包括韦伯对他所谓“经济伦理”的分析，以及对这种伦理怎样有助于或阻碍现代的、合理性资本主义演化的分析。韦伯对经济社会学的第三大贡献可在《经济通史》这一著作中找到。这一著作源于韦伯为学生所做的其讲授的经济史课程（1919–1920）的笔记。学生抱怨，他（根据《经济与社会》第 1 章）讲授的社会学理论和（根据《经济与社会》第 2 章）讲授的经济社会学太抽象了而且难以把握。韦伯听到这种抱怨后，决定对其理论纲要添加一些“血肉”；结果就有了比利用其原来章节的讲稿更具历史针对性的一系列讲稿。

乔治·西美尔 (Georg Simmel) 不仅在普通社会学而且也在经济社会学中占有特殊地位。他是韦伯的朋友，也了解涂尔干。人们一般认为，《货币哲学》(1907) 是他对经济社会学的最杰出贡献，尽管这本著作中真正社会学的内容只占一小部分（特别参看 Simmel, [1907] 1990: 170–190；有关评论，参看 Frisby, 1990）。然而，西美尔擅长对细微之处的分析，这体现在他的整部著作中，如分析信任的作用或经济中的小变化，对吝啬鬼与挥霍者的区别，诸如此类，等等。在西美尔有关经济社会学的其他论文中，我们特别推荐其中一篇关于竞争的论文 (Simmel, [1908] 1955)。

不过，尽管涂尔干、韦伯和西美尔提出了这些饶有兴趣的分析，但随着 20 世纪的推移，社会学家越来越回避经济学的主题，认为它们属于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尽管如此，韦伯和涂尔干的一些学生仍继续在经济社会学方面写出一些专题性论文。其中有些论文今天已失去其思想光辉，但另一些论文仍像它们当初写出来时那样新颖。马塞尔·莫斯 (Marcel Mauss) 著名的专题性研究《礼物》(*The Gift*, [1925] 1969) 和约瑟夫·熊彼特 (Joseph Schumpeter) 在经济社会学方面的论文就符合后一种情况。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受到韦伯很大的影响，我们特别推荐他作品中有关帝国主义和重税国的论文以及其真正的杰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 1975, [1918] 1990, [1919] 1990)。

直到现在，我们讨论经济社会学时提到的只是欧洲社会学家。但是一些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家——我们要特别提到库利 (C.H. Cooley, 他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

6 经济社会学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例如，参看 Cooley, [1894] 1930, [1918] 1966）。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学家也逐步认为自己只研究“社会”问题。根据定义，“社会”问题不同于“经济”问题。这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 1930 年代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建议的明确分工。帕森斯的早期学术职位一直在经济学系（在阿默斯特和哈佛），开始，他把社会学看作是只关注在“手段—目的”链中的价值和“目的”，分配给经济学的任务是分析为达到给定目的的最有效的途径（详细说明参看 Granovetter, 1990）。1950 年代，帕森斯与他的学生尼尔·斯梅尔塞（Neil Smelser）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了这种观点，转而致力于扩大社会学领域并阐述某些经济学问题。他们的纲领性著作是《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1956）。

在这个时候，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者也感到，主流经济学在孤立自己方面已走得太远了。例如，1956 年，哈佛的几个年轻经济学家（受年轻的社会学家——弗朗西斯·X. 萨顿 [Francis X. Sutton] 的激励）发表了《美国的商业信条》（*The American Business Creed*, Sutton and the others, 1956）。1950 年代，有些人类学家认为，经济学理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社会，也适用于前工业社会，卡尔·波兰尼激发他的一些人类学家同事接受他们的挑战。到这时，波兰尼因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944）一书中勇敢地攻击市场社会而闻名已久了。然而，波兰尼与合编者的另一本书《早期帝国中的贸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1957），对经济人类学来说则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该著作实际上引发了经济人类学中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的长期论战。即使在 1960 年代，彼此间强烈的敌意已消失了，但这种论战偶尔还会突然爆发（例如，参看 Orlove, 1986）。

我们现在正慢慢接近 1980 年代早期开始的经济社会学的复兴。确切的来说，是什么激发了它尚不清楚，尽管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加里·贝克尔，突破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旧分工的努力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它有关。不管怎样，1980 年代早期，几个社会学家，包括哈里森·怀特（1981）和阿瑟·斯廷奇库姆（Arthur Stinchcombe, 1983），开始在经济社会学领域展开工作；同时，马克·格兰诺维特发表了一篇论文“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本文集第 2 章），逐渐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宣言。格兰诺维特的论文出于下述信念，即经济学家分析的最薄弱点在于忽视社会结构并或多或少地简化到孤立的个人。为了弥补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分析中认为，社会学家应努力把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社会结构被设想为持续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论文鼓舞了许多社会学家，他们开始对经济社会学感兴趣，复兴早先由卡尔·波兰尼强调的“嵌入性”概念。在 1985 年美国社会学协会年会上递交的论文中，格兰诺维特也强调，现在正在产生的那种经济社会学（他称之为“新经济社会学”）与先前存在过的，特别是 1950 年代在美国存在过的那种经济社会学（旧经济

社会学)有着重要差异。他认为,新经济社会学是鲜明地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而旧的经济社会学则尊重新古典经济学;而且它对谋生之道的经济学问题诸如市场和价格形态等感兴趣,而旧经济社会学则把其大部分注意力专门放在经济边缘的问题上,例如,经济与宗教领域的交叉地带(参看 Granovetter, 1990)。

“新经济社会学”现在已存在将近 20 年,产生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最初 10 年间已完成研究的实例,读者可以查阅《经济社会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Smelser and Swedberg, 1994)第 1 版。人们可以简单扼要地说,新经济社会学所做的最大贡献依靠社会网络理念、组织理论,或者文化社会学;而它的两个主要理论概念是“嵌入性”和“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更多的细节请参看 Swedberg, 1997)。

既然我们所引用的所有专门研究美国社会学家都已做过,那么值得指出的是,当代欧洲的社会学家在这一时期也做了重要贡献。欧洲的几个主要社会学家,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 他在 1998 年去世)、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经常就经济学主题写作。例如,卢曼已试图把系统视角引入对经济的分析;布迪厄除别的论文外还写出论“经济场”的纲领性论文;博尔坦斯基已提出关于“正当理由”(即价值参照)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所起作用的理论(例如, Luhman, 1982, 1988; Bourdieu, 1997, 2000; Boltanski and Thévenot, 1987; Boltanski and Chiapello, 1999, 参看 Bourdieu, 1979, 1986)。欧洲更年轻的一代经济社会学家的也已开始崭露头角(例如, Gislain and Steiner, 1995; Beckert, 1996; Lebaron, 1997; Callon, 1998)。美国与法国经济社会学家的系统比较可以参看格兰诺维特(2000)。<sup>[1]</sup>关于欧洲经济社会学的发展的新信息,可参看《经济社会学:欧洲电子业务通讯》(*Economic Sociology: European Electronic Newsletter*, 1999)。<sup>[2]</sup>

在美国,从 1960 年代开始,哈里森·怀特在哈佛大学帮助发展起来的社会网络观点显然已变得非常重要。马克·格兰诺维特的《找工作》(*Getting a Job*, 1974, 第 2 版, 1995a)即出自这个传统,罗伯特·埃克尔斯(Robert Eccles)和迈克尔·施瓦茨(Michael Schwartz)所做的某些饶有兴趣的专题研究(Mintz and Schwartz, 1985; Eccles and Crane, 1988)涉及储蓄、勤劳以及更一般的互相联系等,同样出自这一传统。人们也已用网络研究竞争、厂商间的做法的传播、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以及其他大量的主题(例如, Davis, 1991; Butt, 1992; Stark, 参看本文集)促进嵌入性概念进一步发展的努力也已利用网络理论(例如, Uzzi, 参看本文集)。

[1] 这篇论文是用法文撰写的;向作者索取可得到该文的英文版。

[2] 在 [www.siswo.uva.nl/ES](http://www.siswo.uva.nl/ES) 可获得这一业务通讯的最近一期。

由于借助组织理论，当代经济社会学家已能进一步做出若干重要的贡献。许多研究致力于证明，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 1984）关于上世纪初始前后大型公司产生的理论忽视了关键的社会因素，诸如国家以及更一般的制度结构的作用等（例如，参看 Fligstein, 1985, 1990; Roy, 1997）。经济学家也因过多地关注单个厂商而遭到批评，尽管厂商可能是组织领域的一部分，由于对资源的需要，它们与其他厂商有联系，而且可能是所谓企业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参看 Burt, 1983; DiMaggio, 1986; Granovetter, 1995b）。性别在组织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也已成为一个重点（例如，参看 Kanter, 1977; Biggart, 1989）。

8 1980年代问世的新经济社会学，许多著作中对社会网络的强调，是以损害正确描述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为代价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塔科尔特·帕森斯累赘和抽象分析类型的反动（参看 Granovetter, 2000）。这构成新经济社会学的薄弱点，保罗·迪马吉奥和维维安娜·泽利泽敏锐地指出这一点（Zelizer, 1988; Zukin and DiMaggio, 1990）。泽利泽已做出几项专题研究，包括人寿保险、货币和儿童的经济价值等，说明将文化的视角引入经济社会学的成果（Zelizer, 1983, 1985, 1994）。擅长对金融市场做民族志研究的迈克尔·阿博拉菲亚最近也表明，从文化角度出发我们可能充分地理解市场（Abolafia, 1998）。在“经济制度的社会建构”中，理解与意义结构更加普遍地起关键作用，嵌入性研究方式拥护者长期以来一直明白这一点，尽管这必须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 经济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传统是深厚的而且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来源，包括经典作家如韦伯、马克思、涂尔干和西美尔。尽管如此，有一个共同核心的若干基本原理，完整构成所谓的结构经济社会学（特别参看格兰诺维特即将出版的作品；同时参看 White, 1992）。这三条基本原理如下：

1. 经济行动是社会行动形式；
2. 经济行动是社会情境中的行动，即嵌入社会的行动；
3. 经济制度是社会的建构。

## 作为社会行动的经济行动

定义经济有几种不同的方式，一些方式在经济学中流行，而另一些方式则在社会学

中流行。比方说，西方经济学最初通常名叫“财富分析”，然后又叫“政治经济学”，而自20世纪开始以来就被简单地称为“经济学”（例如，柯兹纳 [Kirzner], 1976），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定义也变得越来越抽象，而且一般的发展也是以财富对象为中心转到以涉及效用最大化的行动为中心。这也符合相互竞争的定义，经济学作为“交换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或叫做市场交换科学，在奥地利人中也叫做“交易”科学，就如美国制度学派论者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提议的那样（Mises, 1949; Commons, 1934）。

经济社会学比经济学要年轻一个多世纪，在这个学科里，涂尔干根据其关于“社会事实”的一般理论来定义经济现象，西美尔根据“社会形式”，而韦伯则根据“社会行动”和“社会制度”。尽管称号不同，但所有这些定义都共同含有社会行动概念，就如帕森斯在《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中指出的那样，而且我们在这里将要利用的也正是这一要素。我们遵循韦伯的定义：社会行动是行动者赋予意义的行为，也是针对其他行动者的行为；而且经济的社会行动构成社会行动的特殊案例，效用的欲望驱动这类行动（参看 Weber, [1922] 1978: 4, 63-64）。

尽管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都把经济行动用作基本的理论基石，但是这里有重大的理论差异。首先，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假设的行动者——经济人，而社会学则把行动中的现实的人作为出发点。<sup>[1]</sup>除此之外，这还意味着，社会学家考虑行动者的观点，而且试图弄明白他们是如何看待事情的，更一般地说：弄明白他们的“情境定义”是什么。语言和文化因而也作为十分重要的因素进入社会学的分析之中。

9

其结果之一是，经济社会学与工具主义——简化论的观点分道扬镳，我们可以在目前正统的经济学中找到这种简化论的观点。尽管利益对于任何经济活动的解释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纯粹利益驱动的模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曲解。首先，经济活动不仅仅是由自身利益决定的，信任、规范和权力都影响经济行动，因而以各种方式抵消纯粹的自身利益，因此分析者必须以虚心的态度对其加以研究。其次，任何经济行动都不是发生在抽象空间之中——这里总存在更加广阔的影响个人行动并干预纯粹自身利益的社会背景。这些更广阔的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人的经济行动，这是分析者将不得不就每个具体案例加以确定的重要事情。

经济学怎么会形成其目前这种眼界有点狭小的观点，即经济行动基本上是最大化的、理性的行为，而其他任何行动都属于“非经济的”行动？这一点很难说，但有一

---

[1] 这代表一种简化。就如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 1971）特别证明的那样，社会学与经济学必须以分析的形式重新建构现实，因而必须利用关于人们的人为变化形式（“傀儡”）。然而，社会学（再次按照舒茨的说法）是从研究人们出发的，然后才着手进行分析。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的特点是：经济学家描述的关于想像中的经济行动者所做的事情。关于舒茨对经济学的批判，参看《舒茨选集》，第4卷，特别参看“社会世界中的合理性问题”（Schutz, “The Problem of Reticularity in the Social World”, *Collected Papers*, 1996）。

点很清楚，即答案可能在过去的时代。按照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说法，显而易见，人类有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倾向”（Smith, [1776] 1976: 17）。斯密提出的这种狭隘的经济行动概念是人类本性所赋予的某种东西。另一方面，社会影响力通常被视为干扰经济行动的东西。在《国富论》的另一重要的段落里，斯密如此说，“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1776] 1976: 144）。

在《激情与利益》（*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中，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 1977）指出，经济行动与理性的、切合实际的行为同义的观念是西方近代思想史的产物。“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在中世纪欧洲被看成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激情。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某些思想家假定，勤劳和商业将首先抵消并逐步取代追求权力和封建贵族荣耀的破坏性贪欲。包括孟德斯鸠在内的学者赞美“温和商业”的文明化效果。尽管工业化过程在大多数社会里根本不是“温和的”，但是这种思想坚持经济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所有其他类型的行为，因而撇开它们也可能得到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是文化的产物这一点被人忽视了。

经济行动集中体现它自己的封闭世界的这种假设一直促进经济学的发展。但是这种观点已夸大到了不健康的程度，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某段时期，经济学家很少接触其他社会科学。经济社会学强调，对赞美、身份、社会交际和权力的研究不可能与经济行动分开。例如，在这些先驱者中，涂尔干特别强调纯粹经济行动不可能只是短暂地将人们团结在一起，而且大部分经济行动实际上是长期延续模式的一部分。在《社会分工论》（*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1984）中，他写道：“甚至对于完全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社会而言，也不至于化解成为许多并列的、只是外在的和短暂的接触的原子。”实际上，“尽管社会成员完成交换的时间非常短暂，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却超出了这段时间之外”（Durkheim, [1983] 1984: 173）。

10 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其著名的 1944 年的那本著作《大转型》及其成为“实质主义”经济人类学灵感之源的晚期著作（1957）中，也批判认为交换可能等同于经济的想法。他认为，在整个历史中，资源一直通过互惠和再分配加以配置。正是亲属和朋友群体通常在互惠中起核心作用，而国家或某些相似的政治的或集体的权力在再分配中起核心作用。相互之间有互动的商人可能发展出互惠的模式；比方说，与市场交换相比，在许多工场中决定工资增长的方式有较多的再分配要素。在波兰尼看来，在资本主义以这种激进的方式把经济价值提升为人类社会最高的规范之前，经济行动过去一直适当地“嵌入”政治和宗教活动之中，而且通过反独裁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行动可能适当地被再嵌入。

在马克斯·韦伯经济社会学的重要理论文本“经济行动的社会学范畴”中（《经



济与社会》第2章)，他也讨论了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与标准的经济理论不同，韦伯表明，情感往往是经济行动的组成部分，例如，某人做某事是出于对别人的忠诚。他认为，像所有规范一样，经济规范之所以得到维护是由于人们担心别人的反对，这直接与情感相联系。制度的合法性同样也是这样，即人们感到，某些制度安排包括经济的安排是合适的。

韦伯也强调传统经济行为在整个历史上所起到的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在经济理论中它是没有地位的。<sup>[1]</sup>按照韦伯的观点，当传统与宗教制裁联系在一起，要改变事情在实际上就变得不可能了。例如，在信奉印度教的印度，西部地区产生出一种宗教形式——苦行的新教——想要通过循规蹈矩的、理性的宗教行为突破传统并重新塑造社会及其经济。韦伯指出，在当代社会，传统行为也是大量存在的；而且大部分经济行动的规范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

根据韦伯的观点，经济行动总是有其权力因素。这种权力因素可能有两种形式：**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这些权力关系到对经济资源的支配。在韦伯看来，每个社会（包括其经济）归根到底是以暴力为基础并凭借暴力维持的。除此之外，如果暴力被用来获取某种物质好处，那么它就构成了韦伯所谓的“以经济为取向行动”的情况，与利用和平手段的情况形成对比，后者被简单地称为经济行动。

因此，经济行动构成社会行动的一种形式的这种观点，在许多关键点上，明显区别于经济理论中使用的经济行动概念。这意味着，经济理论与经济社会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在同一认识论角斗场中并不对抗。但是它同时意味着，经济社会学有更广博的素养去处理许多经验问题。经济社会学从来不可能达到主流经济学已达到的那种分析的简洁和数学的优美。另一方面，只要主流经济学用简化论的经济行动概念进行操作，就如它今天所做的那样，那么它要说明在许多现实经济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就总是有很大困难。

11

## 经济行动是社会情境中的行动，即嵌入社会的行动

方法论个人主义应用于经济学的方式直接与社会学的研究方式对立：它从个人出发，而且从他或她的行动出发去构想厂商、社会制度和其他宏观现象。对社会学家来说这很成问题，这有几个理由。首先，个人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经常接触的。其次，就如阿尔弗雷德·舒茨（1971）已经指出的，他一出生就进入先赋的社会世界之中，而且这意味着，当个人出生时，复杂的社会结构总是存在，而且

---

[1] 不过，可比较一下某些最近的非正统的演化论经济学对“习惯”理念的强调，比如霍奇森（Hodgson, 1993）。